

# 第一章 导 论

## 一、问题的提出

和平与发展是世界性的两大主题，贯穿于 20 世纪人类社会的全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关于发展问题的研究成为各国学术界的核心主题之一，因而也产生了诸多后来成为经典之作的学术精品。譬如，20 年代有伊斯特（E. M. Esat）的《十字路口的人类》（1923）；30 年代有熊彼特 Joseph A. Schumpeter 的《经济发展理论》和凯恩斯 J. M. Keynes 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40 年代有皮尔逊和哈珀（F. A. Pearson and F. A. Harper）的《世界的饥饿》（1945）和福格特 W. Vogt 的《生存之路》（1949）以及战后三部有代表性的经济发展问题的专著：斯塔利（E. Staley）的《世界经济发展》（1944）、曼德尔鲍姆（K. Mandelbaum）的《落后地区的工业化》（1947）和罗森斯坦—罗丹（P. A. Rosenstein-Rodan）的《东欧工业化问题》（1943）进入 50 年代以后，随着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产生，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摆脱从农业社会的不发达状态进入工业社会的发达状态成为发展问题研究的中心议题。1948 年哈罗德（R. F. Harrod）发表了《动态经济学导论》以及 1957 年多马（E. D. Domar）发表了《资本扩张、增长率和就业》、《扩张和就业》两文探讨了经济增长理论和增长模式，被合称为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式（Harrod - Domar

Growth Model);1954 年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 (W. A. Lewis )发表了题为“无限劳动供给下的经济发展”的文章,创建了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这成为发展中国家有关城市化理论的鼻祖;1955 年,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 (F. Perroux)发表了“略论‘发展极’的概念”一文 提出了“发展极”理论 成为城市化动力理论中“大城市动力论”的首创者;1957 年 缪尔达尔出版了《经济理论和不发达地区》专著 提出了“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成为城市化理论中城乡协调发展的经典理论;1961 年,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拉尼斯 (G. Ranis )和美籍华人发展经济学家费景汉继承和发展了刘易斯理论,发表了题为“经济发展理论”的重要论文 人称拉尼斯—费模式 同年 美国经济学家乔根森 (D. W. Jorgenson)发表了“二元经济的发展”(1961)和“剩余农业劳动与二元经济发展”(1967) 创立了一个新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 人称乔根森模式;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 (M. P. Todaro)发表了一系列论文 提出了二元经济三部门结构理论,指出消除人为的城乡差距,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农村的居住生活条件等等措施和主张,这可以成为发展小城镇与农村工业化的始作俑者;1960 年,罗斯托 (W. W. Rostow)出版了《经济增长的阶段:一篇非共产党宣言》,标志着西方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阶段问题的研究已经上升到了系统分析的角度,他以经济“起飞”为核心概念 将社会经济阶段划分为 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大规模高额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等 6 个阶段,为城市化发展提供了一个参考系。

70 年代,由于人口的快速增长,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爆炸,工业化、城市化浪潮引发的资源危机、能源危机、环境危机等等,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以关心未来、研究未来为主旨的罗马俱乐部先后发表了一系列警言式的重要研究报告,首篇报告以

梅多斯 D.L. Meddows 等人主笔的《增长的极限》(1972) 引起了全球学术界、政府领导人等的广泛关注并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后，一系列报告发表：《人类处在转折点》，《南北关系：从挑战到对话》，《冲出浪费时代》，《人类的目标》，《能源逆流》，《学无止境》，《占世界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关于财富和福利问题的探讨》，《未来前景描绘》，《世界的未来》，《经济振颤》等等。这一切对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提出了参考和反思，对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也提出了反省。

20世纪60—80年代，是全世界工业化、城市化高速增长的时代。经济高速增长以及人口爆炸所造成的众多问题与危机，加之罗马俱乐部的警世报告，使政府部门、学术界的关注达到高潮。以前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Gro Harlem Brundland)及其所主持的有21个国家研究环境与发展问题的著名专家组成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在全球范围内历经900天的调查研究于1987年4月发表了长篇调查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Our Common Future)，它系统地阐述了人类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即“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这一概念得到了全世界的广泛接受和认可并于1992年在巴西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政府首脑会议上得到共识，从而成为全世界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所遵循的基本原则。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过程中走过了一些弯路。西方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历史表明，工业化与城市化应当是同步进行的。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追赶发达国家，快速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中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走向了一条重工轻农的国家工业化的道路，使得城市化发展远远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以斯大林国家工业化理论为模式，中国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开始了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建设。为此，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工业化与城市发展的观点或理论。譬如，关于以赶超战略实现国家工业化的理论；关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理论（赶超战略的核心）；关于依靠内部积累实现工业化的理论（实为依靠剥夺农民剩余和城市市民的必要消费资料而积累）关于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理论；关于重视物质生产领域、忽视非物质生产领域的观点；关于实行计划经济、否定市场调节的理论等等。这一切，都对我国的城市化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实际上，从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城市化发展及其理论的研究一直处于停顿阶段，充其量也仅仅是关于个体城市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改革开放以后，世界经济与城市化的发展让国人震惊，为此，有关城市化发展的理论被逐步介绍到国内；同时，研究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文章也不断涌现，文章多从人口学、社会经济学和地理学等方面来探讨城市发展的路子，最多的文章还主要是研究个体城市发展的问題。与此同时，80年代初，反对中国城市化的文章和观点也出现了，引起了一次小小的论战。如：张承安的“城市化不是我国城乡发展的道路”<sup>①</sup>；陈可文等的“论城市化不是唯一的道路——兼与宗寒同志商榷”<sup>②</sup>等等。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农业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壁垒的围困下，农村生产力仍然不能得到完全解放。1984年，中共中央颁布第1号文件，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小城镇（但不许进市经商，也不许从事第二产业）从而把固锁于土地的农民剩余劳动力得以有限的释放。在这一形势下，理论界开始了农民“离土不离乡”、“离土又离乡”的争论。此时，许多的政治家、

载《建设经济》，1983年第2期，第18—21页。

载《求索》，1982年第5期，第27—32页。

社会活动家、学术界专家学者都参与了这场争论。结果，“城乡一体化”论者占得上风，把“离土不离乡”与“离土又离乡”的争论模糊掉了。由此开始，关于我国城市化发展的研究也变成了主要是个体城市的发展研究。研究具体城市的发展、从城市角度出发单向研究城市化的发展成为理论界、学术界的主流，而从乡村角度和城乡双向角度的研究成果比较少见。

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社会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特别是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以及出现的“村村点火、队队冒烟”的农村工业化遍地开花的局面所引发的中国资源问题、环境污染问题、人口问题、贫富悬殊问题、农业问题以及城市中产生的交通问题、住房问题、教育升学问题、城乡就业问题等等，引起了政府与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以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小组为代表的国情系列研究报告《生存与发展》（1989）等，引起了政府与学术界的广泛反响。由此对工业化、城市化又一次进行了反省。郭书田等“失衡的中国——中国城市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于1988年在《农民日报》进行了创纪录的14次连续转载，1990年成书付诸桑梓，1989年何博传《山坳上的中国——问题、困境、痛苦的选择》著作出版。与此同时，一批国家“八五”哲学社会科学、经济学的重点研究课题的成果出现。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承担的“八五”重点课题《发展与危机——长江流域发展战略思考》于1996年公开出版，著名经济学家谷书堂等人承担的“八五”重点课题“经济和谐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协调稳定发展研究”于1993年发表等等。这些研究成果，以具体问题为研究中心，从宏观或某一个侧面提出了我国城市化发展更主要是社会经济思路。

在传统的城市化理论主体研究者的地理学界、人口学界和经济学界，也取得了大量的有关城市发展与城市化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成果。许学强《现代城市地理学》（1988）出版，周一星《城市地理学》（1995）出版，叶舜赞“城市化与城市体系”（1995）发表，顾朝林

“中国城镇体系”(1992)、“城镇体系规划的理论与方法初探”(1990)、“地域城镇体系组织结构模式研究”(1987)等发表 姚士谋《中国的城市群》(1992)、《城市用地与城市生长》(1995)出版。地理学界主要是从城镇体系布局、城市用地、城市生长以及城市化水平的预测来研究我国的城市化发展的。人口学界主要是从人口的分布与迁移、人口与资源、环境等方面来研究城市化的 潘纪一《人口生态学》(1988)出版。中国的发展经济学家和现代化理论家也对城市化理论的研究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程必坚《区域经济学》(1989)出版 谭崇台《发展经济学》(1989)出版 张培刚《新发展经济学》(1992)出版;陈宗胜《新发展经济学:回顾与展望》(1996)出版 中国著名现代化理论家罗荣渠《现代化新论》(1993)出版;等等。以上学科的研究,更多的是从本学科的角度但其中只有较少的篇幅论述了城市化发展的有关理论与问题。

1988年城市化的研究取得较大成果 两部论文集出版。《中国城市化道路初探》(1988)集结了80年代中后期所发表的有关中国城市化的论文;《国外城市化译文集》(1988)由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非公开出版。进入90年代,有关城市化的专题研究论文取得丰硕成果。经中国科技信息情报中心的联网检索,从1989—1995年共7年时间以关键词“城市化”检索从6000余种中文期刊论文库中共查出295篇有关“城市化”的论文 譬如李迎生的“论我国城市化战略的阶段特征与区域差异”(1989) 周念念的“农村城市化发展中的地权问题”(1989) 但建南的“湖北省城市化现状与发展”(1990) 朱通华的“小城镇建设与中国城市化道路”(1990), 高波的“论工业化、城市化与粮食增长”(1991) 李松林的“乡镇企业的发展对城市化道路的影响”(1991) 孟晓晨的“城乡劳动力的转移与城市化”(1992) 赵建新的“关于城市化规律某些数量关系探讨”(1993) 鲍世行的“中国的城市化及其发展趋势”(1994) 许学强的“珠江三角洲的工业化与城市化”(1995) 顾朝林的“论中国

建制镇发展，地域差异及空间演化——兼与‘中国反城市化论’商榷”(1995)，张文奇的“陇海—兰新地带城镇发展研究”(1995)郑重的‘探索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之路’(1995)吴良镛的‘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化进程中建筑环境的保护与发展：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1994)等等。所有文章大都是从某一个角度对城市化进行专题分析与研究。

1985年加拿大学者麦吉 T. G. Mcgee 提出在亚洲某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印度尼西亚的爪哇、泰国、中国大陆和台湾省的经济核心区域出现了与西方的都市区类似而发展背景又完全不同的新型空间结构。这一状况麦吉于 1987 年始称之为 Desakota 模式，其所指的是出现于人口密集的亚热带或热带地区，处于大城市之间的交通走廊地带，借助于城乡间强烈的相互作用，带动了劳动密集型的工业、服务业和其他非农产业的迅速增长，实现了居民职业活动和生活方式不同程度的转变。

进入 90 年代，国际上对中国发展问题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的成果。最著名莫过于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教授的《Wake-up calls》(醒世呼唤)以及《关于谁将养活中国》、《中国对美国 and 地球的挑战》等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他认为，中国不应该采用美国的发展模式，走美国式的发展现代化道路，中国应该走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与此同时，对世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城市化问题的研究和介绍也取得了不少的成绩。如：冯华的“国外的乡村城市化”(1989)邓宝其的“台湾的城市化和有关的城市问题”(1989)，杨绍澄的“苏联城市化的进程与趋势”(1990)贺华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与城市化’(1990)高佩义的‘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研究’(1990)章兴泉的‘世界城市化的新趋势’(1990)范作申的“日本城市化的问题与课题”(1992)应世昌的‘美国的城市化’(1992)，孙士海的“印度的城市化及其特点”(1992)赵士修的‘城

市化问题：访美考察随笔”(1993) 张大勇的“东盟国家城市化问题浅析”(1994)，唐晓阳的“80年代以来美国城市化发展的新趋势”(1994)等等。这些论文，为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及其理论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所有以上研究有关城市化的学术著作或文章，都是从城市的角度来剖析和研究的。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的城市发展、工业化发展和城市化发展，对农业的剥夺程度也越来越严重，由此，许多的农业专家开始了从农村经济发展的角度来探讨城市化问题。如：牛若峰的“中国农业的变革与发展”(1997) 赵昌文的“农业宏观调控论”(1996) 陈吉元的“中国农村工业化道路”(1993) 毛科军的“中国农村产权制度研究”(1993)等等。

1997年有关中国城市化的第一部专著、刘家强的《人口城市化——中国城市化的道路、模式与战略选择》正式出版，从而使我国城市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比较系统的研究阶段。

总览这些浩如烟海的有关城市化问题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发现，诸多研究与其说解决了不少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毋宁说随着城市化本身的发展与理论研究的深入，更引出了诸多需要再深入系统研究的问题。一方面，这与城市化课题的性质有关，那就是，城市化的涉及面十分广泛，联系的社会经济等因素众多，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因而使得它在学术领域常究常新，作为一个复杂而艰巨的难题始终居于前沿地位；另一方面，正是因为城市化问题涉及面广泛、联系因素众多而为许多学科所研究，而这些研究，在不断取得突破和进展的同时，也引出了许多研究上的问题；特别是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当今和进入21世纪的重大的发展指导原则，这一切更引起了我们对城市化问题的深刻反省。

这些问题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首先，对城市化问题研究的角度有偏颇。上述各科研究成果，

主要是从三个角度进行研究，即：从城市发展为主的角度，或是从农村发展为主的角度，或是从各个学科本身的专业角度。而实际上，城市化是关于城市与乡村二者共同发展与演变的学问，无论从哪一个角度为主的研究，都存在偏重的问题。而要整体把握城市化发展的脉络，就必须从城市——乡村这两者的双向互动关系来研究。

其次，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当今和进入 21 世纪的行动纲领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最根本指导原则。而城市化的初期发展过程，是整个社会经济的巨大分化过程，其中必然会引起城市地区与乡村地区的代内不平等和代际的不平等。所以，考虑如何让城市化发展不以牺牲或尽可能少牺牲乡村的发展为代价，寻找城市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切合点，就成为研究城市化与城乡空间关系的新的课题。

再次，从上述众多的研究成果分析发现，这些研究多对城市化过程这一时期进行的是就事论事式的探索，缺乏从更宏观的历史背景下对城乡空间关系加以综合分析 with 系统探究；同时，缺乏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城市化问题论述的深入研究，不少文章还停留在引用几句伟人论断上。而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对于城市化与城乡空间关系的论述是非常系统和完整的。如果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从世界历史、中国历史的史证中去探索城乡空间关系的起源及其城乡空间关系的发展演化，并对其进行全面的剖析和论证，就会寻找到一个城市化前期、城市化时期、城市化后期（稳定整合期）的城乡空间关系发展、城市化过程发展的全景图。

再其次，从城市化发展的动力而言，上述所有研究都是认为有两种力量：城市拉动力和乡村推动力。无疑，这两种动力都是存在的，这种说法也是可行的。然而，从所有的城市化动力理论的研究来看，这两种力量缺乏有机的统一。既然是作用于同一事物的两种力量，它们就必然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这也是自然科学

和社会科学的一般规律。因此，必须研究这两种动力的有机统一关系，寻找一个共同的最基本的动力表述方式，从基础理论层面上探索城市化发展的动力关系。

最后从城市化的概念本身而言如前所述它不惟某一学科所专美，而是几乎所有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许多自然科学或多或少地涉及城市化的问题。应当说，研究成果是相当丰富的，然而与这种资料的丰富性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对于城市化这一概念，都当作是一个不言而喻、不说自明的概念来使用，至于城市化具有什么样的外延和内涵，则以为无需讨论。即使有所讨论也是蜻蜓点水，简单解释。举凡涉及城市化之处，在不同学科里，讨论的侧重点并不一致，更重要的是，许多讨论之间根本就不是同一层的意思。譬如，一般情况下，城市化的简单和最直接的含义是指城市人口数量占该国家或某一地区的总人口的比重这一数量关系；经济学认为城市化是工业化的结果，是工业经济与农业经济的关系问题；人口学认为城市化首先是人口的迁移及其人口质量的变化等等；社会学认为城市化是人类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互动过程；生态学认为城市化是人类寻找最佳生态位的过程；等等。对于城市化概念的确定，弄清楚其根本的含义，这成为研究城市化问题的最基本问题。

应当说，这五个方面的问题也是城市化研究或者说城乡空间关系研究的基本问题，是不容回避的。这既是城市化研究的困难之所在，也是其学术价值之所在。因此，对于一个如此复杂而有学术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问题进行研究，特别是在前人的、多学科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这正是本书的出发点。

有关城市化问题的关注与研究，是笔者近 10 年来一直热心的课题。1996 年 8 月，本课题在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立项，两年后的 1998 年，有关城市化问题的研究成为当前有关学术界的热点课题之一。从这一点而言，这些问题的研究是非常及时的。

## 二、研究的意义

本书的研究是建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的，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深入化和系统化的一次尝试。因而，其意义也就与前人的研究有必定的联系。

作为一个理论问题，城市化问题并不是今天才形成的新课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经济学、人口学的经典命题，也是其他有关学科的一个研究的重点之一。城市化的发轫，公认为起源于工业革命和工业化的发端，但是，要研究更宏观背景下的城乡空间关系，就必须从城市的产生和城乡空间关系的起源开始。不仅如此，在此后的思想流变和理论演变中，城市化问题始终是学术界的一个焦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正处在城市化的进程之中，对城市化的研究和关注也就更加迫切。

在中国有关城市化问题的研究是改革开放后才开始受到关注的，而对于城乡空间关系的研究却是源远流长。不过，从现代意义上的城乡空间关系来研究城市化问题，却是一个全新的角度。

目前有关城市化问题的研究，大致有以下三个特征。

### 1. 注重当代研究者较多，历史研究者较少

有关世界城市化问题的研究，大部分都是停留在对近现代的研究，对历史上的研究也只有一个城市人口的数字或人口比重，缺乏从城乡空间关系的背景下系统把握城市化的发展状况；对中国城市化问题的研究也是如此，除了对城市人口比重的变化关系进行讨论外，就是对建国后我国的国家工业化政策所造成的城市化发展的滞后进行严厉地指责，在诸多学科的研究中，一涉及 50—70 年代中国城市化的发展问题，言必称“失误”，缺少比较客观中

肯的分析研究。而历史的真实却并非完全如此。何以见之？这通过对历史的研究和在宏观的国际国内大背景下对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全面综合的考察，就会得出这一明确的结论。

从这一点而言 通过历史的研究 弄清楚建国后城市化发展的政策措施是‘失误’还是‘应当如此’”纠正某些错误的或模糊的观念 这有助于我国城市化发展的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更主要的是理顺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在当时的国际背景和中国国情下的政策延续性。

### 2. 某一学科的专题研究型较多，综合研究型较少

有关城市化问题的研究，多见于一个大课题下的某一个专题，大多不是为城市化问题而设。譬如，有关人口学的论著、发展经济学的论著，其中都有涉及人口迁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产业结构的演化等有关城市化问题的探索；另外，大量的论文研究本身就是专题性的研究，以其篇幅容量根本不可能进行综合性的分析与发掘。因此，对城市化问题进行全面地、综合地分析与研究，探索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也是本书研究的意义所在。

### 3. 描述客观现象与单向研究型较多，深入剖析内在机理与城乡双向研究型较少

许多城市化问题的研究大多停留在表面的描述上，要么以城市为主进行描述，要么以乡村发展为主进行描述，要么以学科的专业要求进行描述。许多都停留在数字的表述与变化、空间的扩张或演变为主的描述上，也有不少是更加专业化的学科特征的论证等等。而至于联系多方面的、综合性的分析研究，特别是从城市——乡村两者的空间关系进行系统研究则比较少见。

本书作为在城乡空间关系宏观背景下对城市化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一次尝试，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也正是弥补了上述研究的不足。即：本书试图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把专题研究与综合研

究结合起来，把描述研究与内在机理的关系研究结合起来。这样的研究，对于城市化理论的发展而言，应当是具有一定意义的。

首先，这一研究将有助于城市化理论的发展。通过对城乡空间关系的系统研究，可以站在历史的高度，把握城市化发展的脉络，澄清某些不必要的误解和错误的认识。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原则，以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的“三个有利于”为判断标准，以江泽民同志《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为理论与政策依据，以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发展为参考借鉴，以中国两千多年城乡空间关系发展史为坐标，建立其一个基础理论层面的城市化基本理论体系。

其次 通过对中国城市化问题的研究 在城乡空间关系的宏观背景下，有助于正确、全面地认识和理解中国城市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如前指出，对共和国建立之初发展工业化而造成城市化发展滞后的认识，存在着片面、简单和绝对化的倾向。最突出的一点就是，简单地将共和国建立后的城市化发展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就事论事 片面地得出中国城市化发展滞后以及政策失误“文革”除外)的结论，全然不顾中国的历史传统以及近现代半封建半殖民地历史的事实 更没有顾及在当代中国 50—70 年代所处的两大阵营“冷战”时期的国际环境 把当年的“自力更生”说成是“闭关锁国”，根本没有认识到是某些超级大国对中国实施的国际封锁。由于对中国当代城市化发展缺乏客观公正的评价，因此，对当代的发展及政策建议也就有些不切实际，更甚至于急功近利、竭泽而渔。所以，全面地认识中国城市化发展以及从宏观背景下认识城乡空间关系的真实状况以及历史传承，不仅有必要而且更有现实意义。

再次 通过这一系列的综合研究 有助于中国城市化发展问题研究的深入展开。研究城乡空间关系的演变，研究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城乡空间关系的演化，对于一些基本的概念问题、动力问

题、模式问题、演化方式问题等 提出一些个人的见解 以期能引起大家的重视，来共同为中国的城市化理论的发展尽微薄之力。

最后 通过对中国城乡关系与城市化问题的研究 特别是从城乡空间融合的基础角度，通过反哺农业、加强对农业的保护、加快小城镇的发展与乡镇工业化发展的理论与政策研究，有助于认识和理解现实中存在的城乡关系问题，为政府制定有关政策、采取相应措施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依据，也有着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这正如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所言：“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提出的战略部署，实现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宏伟目标，必须保持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十二亿多人口，九亿在农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稳定，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面对当前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进一步加强农业 繁荣农村经济 提高农民购买力 有利于扩大内需，保持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良好势头，增加我国在国际合作与竞争中的回旋余地。在充分利用国外市场的同时，努力开拓国内市场特别是农村市场 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

### 三、研究的框架

本书的研究在于对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进行系统的探索，为了更确切地、全面地、系统地把握这一脉络 故将它放在一个更宏观的大背景下研究，即把城市化发展放在城乡空间关系的起源、发展、演变的大系统下进行综合研究。这种系统的探索包括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专题与系统的统一和描述与分析关系的结合。而研

究框架的构思，则体现了笔者对城市化与城乡空间关系的理解。从历史长河的发展进程看，城市化仅仅是城乡空间关系的一段时期，城市化只是这一段时期中城乡空间关系急剧变化的主体部分，只有从城乡空间关系的宏观背景下研究，对城市化的发展过程才能作出更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

对于城乡空间关系的起源、发展、演化及其城市化过程演变的时空分析可以用框图简练概括（如图 1-1、1-2 所示）。

本着能够尽可能客观地、全面地和系统地反映出城乡空间关系与城市化发展进程的本来面貌，本书的研究就从历史发展序列开始。其框架如下：

除了导论外，共分六章展开论述。这六章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对城乡空间关系的起源、发展、演化的过程进行了回顾与评议（第二、三章）这种评论不是简单地表述而是对城乡空间关系的深切理解，重新对城乡空间关系作出了更合乎其本来面貌的时空划分。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世界历史发展演化的观点，通过对世界通史上古部分、中古部分和近代部分以及中国古代史上、下部分有关城乡空间关系的认真总结与分析，提出了城乡空间关系起源的标志，以及随后把城乡空间关系的历程划分为五个时期。即：城乡空间共生时期，城乡空间分离时期，城乡空间对立时期，城乡空间平等发展时期和城乡空间融合时期。并对各个时期的特征及其原因进行了充分的分析和论证。

其次根据城乡空间关系历程的划分对中国近现代城乡空间关系的演化进行了充分的论证（第四章）。书中对中国城乡空间分离、对立及其特征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中国城乡空间两次被动分离的观点，同时，对中国与西方国家城乡空间分离、对立的特征进行了比较与分析。

再次，以中国城乡空间关系由平等发展向融合的转折为切合

点，论证了中国城乡空间融合的基础（第五章）。在提出城乡空间融合概念与分析其特征的基础上指出，加强对农业的保护以及工业经济反哺农业经济；乡镇工业化是城乡空间融合的主要力量；加强小城镇发展是实现城乡空间融合的最主要手段；“三集中”模式是实现小城镇发展的第二次飞跃和城乡空间融合的新实践。

再其次以系统科学和耗散结构理论为指导提出了城乡空间融合的动力学说。在对有关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动力理论综述的基础上，正式提出“城乡差别效应是城市化发展及其稳定整合的动力”的论点。对城乡差别效应的概念、作用、动力结构系统、动力模型建构、动力主体运动的方式等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在此基础上，对这一学说与其他城市化发展理论的融合、运用进行了阐释；提出这一论点，是针对城乡差别还在不断地扩大，学术界存在着把城市化发展“中心城市拉动力”与“乡村发展推动力”对立起来的倾向，而“城乡差别效应论”则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与此同时从理论角度和现实发展指出了“城乡一体化”观点的不当之处。

最后，以大量的篇幅对城乡空间融合的模式进行了阐述。在发达国家城乡空间融合模式的实证分析基础上，明确提出我国城市化发展所处的阶段，即：正处于由城乡空间对立向城乡空间平等发展的转折点期；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城市化发展的五种模式，上海模式、苏南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温州模式和胶东模式进行了实证剖析研究。以这些实证研究的结论和本书理论阐述的结合，提出了我国城市化发展中的政策与理论建议。

以上五个方面的研究，第一个方面是城乡空间关系阶段划分理论的分析；第二个方面是对这一阶段划分理论的历史验证；第三个方面是多学科的综合与演绎；第四个方面是基础理论的演绎与归纳，是新理论的建构和补充；第五个方面是实证研究和归纳。因此，本书将包含着基础理论、技术理论、应用方法三个层次的理论与应用的研究。

最后 全面概括总结。

#### 四、概念使用及其界定

根据本书框架的构想，以及对城市化、城乡空间关系的理解，有必要对城市化、城乡空间关系等几个概念及其使用作出一定的界定，以明确其指代及意蕴。之所以要对城市化概念本身作一界定，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是因为城市化作为一个基本的概念，在广泛运用的同时，却有着不同的所指。譬如：

人口学认为，城市化是指农村人口不断涌向城市，是人口的地理迁移过程，是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是乡村变为城市的过程。

经济学认为，城市化就是工业化，是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化过程，是人口经济活动由乡村转向城市的过程，是农业资源非农化的过程，是生产方式的转化和产业结构的演化过程。

社会学认为，除经济因素外，城市化是人类文化教育、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等的社会演化过程，是社会结构的变化，是人在各个方面更加社会化的过程，是个人、群体和社会之间相互依赖加强的过程，是传统性逐步减弱、现代性逐步增强的过程。

生态学认为，人类是一种高级生物种群，人类生态系统的形成、演化过程就是人类不断地寻求最适宜生态位的过程，城市化过程就是城市生态位更加优化于乡村生态位的过程。

而刘家强博士对于城市化概念的总结与概括，似乎仍然是停留在经济和人口的表述研究上。他给出城市化的定义只有三种表述：(1) 人口城市化的实质应是人口经济活动的转移过程；(2) 人口城市化的直接表现形式是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产业人口；(3) 人口城市化的内容包括相互联系、相互